

Die SPD.Vom Proletariat zur Neuen Mitte by Franz Walter
Copyright © 2002 by Alexander Fest Verlag Berlin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Rowohlt Verlag GmbH,Reinbek bei Hamburg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版根据德国 Alexander Fest Verlag Berlin 2002 年版译出,重庆出版社独家出版。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版贸核渝字(2006)第 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无产阶级到新中间/[德]瓦尔特著;
张文红译.一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4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
ISBN 978-7-5366-9596-2

I.德… II.①瓦… ②张… III.社会民主党—党史—
德国 IV.D751.664-09

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无产阶级到新中间

DEGUO SHEHUI MINZHUDANG: CONG WUCHANJIEJI DAO XINZHONGJIAN

[德]弗兰茨·瓦尔特 著

张文红 译

出版人:罗小卫 丛书策划:刘玮
责任编辑:别必亮 责任校对:李小君
版式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蒋忠智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3.5 字数:205千

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ISBN 978-7-5366-9596-2

定价:2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Contents

总序 1

一段漫长解放历史的终结?! ——中文版作者序言 1

续写辉煌抑或雄风不再? ——译者序言 1

开端:从徒工反抗到工人运动 1

帝国时期:革命者的未来梦想和现实的对立世界 7

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祖国的爱国者 25

德国革命:分裂与迷惘 30

20世纪20年代:在阶级环境和人民党之间 38

魏玛共和国结束:反对“共粹”和纳粹的斗争 47

纳粹时期:“人民联盟”的尝试 58

苏联占领区时期:环境的瓦解 68

阿登纳共和国:“再度靠边站” 77

过渡时期:告别传统队伍 91

20世纪60年代:“所有时期最好的基民盟” 98

社民党—自民党时期:觉醒和失望 111

科尔时代:“孙子们”的舞蹈 132

结束语:在柏林共和国 161

时间简表 169

参考文献 175

一段漫长解放历史的终结?!

——中文版作者序言

—

自 1998 年以来,社会民主党(简称“社民党”)未间断地统治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而令人奇怪的是,这在社民党基层却没有引起愉悦。在德国国内,几乎碰不到一个为其政党和政府而自豪的同志。社会民主党昔日的烈焰如今只是冷灰残存了。

这些烈焰正是曾经刻画了社会民主党人性格的熊熊燃烧之火。特别是在历史上的艰难时期——在专制国家直到 1914 年都在诋毁和压制他们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更是其政党的激昂斗士。距离权力越远时,社会民主党人就越热情地投身于他们的“事业”。社会民主党虽然处于社会的边缘,很多时候是孤单寂寞的,有时是受屈辱的,偶尔还受到威胁,在绝大多数时期是没有影响力的。但是他们的气氛是乐观的,而且对未来充满信心。

长期以来,这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真正本质,即它是天生的反对党。社民党在反对派的位置上度过了 110 多年;他们只在不到 30 年的时间里单独执政。反对派——长期以来——是他们的命运。社会民主党人——长期以来——喜欢这种宿命。因为这使他们伟大而自信,并且使得他们获得了更好的人的光芒;因为他们在几十年中不只是简单的反对派。历史上,他们曾经在 1/4 个世纪里遭到国家的迫害、被驱逐出境、被投进监狱;在最恶劣的时期,曾经被严刑拷问、被杀戮、被处决。然而,这一切却未阻止社会民主党的发展;相反,国家的压迫还在道德层面上提升了他们的政治使命。对于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来说,这种体验是最起码的,即他们在痛苦中成长。因此,社会民主党人简直就是乐于承受痛苦。

社会民主党人是作为反抗受压制的公正的斗士和经过痛苦考验的斗士，而不是作为执政当局的代表，经历了他们真正伟大的幸运感。

因此，当社会民主党人，几乎是不情愿地，进入政府的时候，往往就表现得非常束手无策。面对引以为自豪的苦难时期的伟大梦想，社会民主党参与的小联盟政府总是很平庸。无论社民党何时参与执政，其成果看起来都是无关紧要的，而且与其原本的要求相悖。因此，德国人有了这样一种印象，即社会民主党人并不真正适于执政，他们总是经历着自己内部的争吵，令人惊奇地以自我毁灭的方式诽谤自己的成就。

但是，社会民主党绝不因此就是国家主义的政党；相反，它长期回避国家。所以，社会民主党人也很少拥有改变国家的精确计划，他们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没有经济转轨的具体方案。社会民主党在德国太过执著于自身文化了。然而，这种闭关自守的文化的界限在社会民主党 100 年的自救运动中同样清晰可见。社会民主党人建立了令人钦佩的工人教育体系，但它却从来没有取代国家认可的高中毕业考试或者大学毕业考试。通过社会民主党的公民社会，没有实现工人阶级的历史解放，没有建立至少是对所有社会阶层平等的机遇前提。

不是工人教育体系，而是国家在 20 世纪 60 ~ 70 年代推进的教育改革实现了社会的繁荣。“新中间”时代在这些年里开始了。或许这也意味着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从前那种专业工人最高等级的解放运动的终结。那主要是维利·勃兰特时代之前的社会民主党，即在德国以社会地位升迁为导向的专业工人的政党。100 多年来，这个雄心勃勃的、有才干的阶层一直由于资产阶级教育特权而被禁止通过接受教育来摆脱他们的社会处境，凭借知识在社会里向上攀升。通过勃兰特总理和施密特总理时期的教育改革，专业工人的上层获得了其历史机遇。从此，这个以前由车工、矿工和印刷工人组成的政党日益成为由教师、管理职员、社会工作者和平等问题专员组成的“新中间”的政党。

从那时起，落在后面的其余的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依然是孤单的。社会民主党从前领导人的地位升迁了，现在说着另一套话语，衣着更好更贵，喝着葡萄酒，而不是啤酒了，住房更加精致而且位于市中心，远离了从前的住处。因此，作为共同主体的其余的无产阶级和次无产阶级崩溃了。无组织的下层阶级和“新中间”的社会民主党之间的联系断裂

了。其余的工人阶级失去了政治的家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没有哪一个其他社会阶层像他们那样易变,最终在选举弃权、投票给基民盟和支持新的“左翼党”之间逡巡;反之,社会民主党则和自己从前的主体脱离了,放弃了这些人或者任其留在党内。被抛弃了的主体因而宣布放弃对党的忠诚。在这个过程中,社民党自 21 世纪以来在一次次州议会选举中失败。

二

这样,社民党只在老联邦共和国的一个州仍然担任州长。在共和国经济繁荣的现代化地区,从德累斯顿到斯图加特,社会民主党人被困在一种近乎无望的少数派境地之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社民党还可以利用莱茵和鲁尔之间的地区,以及黑森州、萨克森州或者汉堡的优势来均衡由于结构性的或历史的原因引发的在德国南部的劣势。然而,这一切都结束了。

如果论述社民党的话,那么就等于是概括了一部失败的历史。流失的不仅仅是党员群众和有战斗力的干部群体,一同消失的还有恰恰是在传统的社会主义里数量众多的、往往有点古怪,但却始终形象生动的知识分子和思想家:斐迪南·拉萨尔、埃德华·伯恩施坦、卡尔·考茨基、罗莎·卢森堡、鲁道夫·希法亭——可以从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上再随意举出 50 个具有理论原创力的人物的名字。再一次地,这一切都结束了。

而且,社会民主党人与工会人士的生活世界完全脱离了。长期以来,这两个区域形成了一个组合,在其中,企业经验和政治能力结合在一起。然而,今天却没有一个工会领导人还属于社会民主党的联邦议会党团,地方的企业职工委员会委员也不再同时是社民党地方支部副主席和社民党市议会党团成员。在历史上,工会人士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关系紧张的情况总是不断出现,但 1999 年之后发展起来的这种极度的疏远在历史上却是全新的——尤其是许多大工会中坚力量的重要部分很可能不仅仅是短期地背弃了社民党。社会民主党人从前安全的前沿阵地,现在似乎成了“左翼党”招募新人和培养干部的地方。无论如何,在 100 多年里,工会人士曾是社会民主党的一个支柱。在此处也是:这一切都结束了。

在过去几十年里,社会民主党人经常表现得不灵活,他们过度的派别

之争往往是令人紧张的,他们在权力政治诡计上的欠缺有时又是令人同情的。然而,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光环却围绕在这个 100 多年来尽人皆知的反对派政党周围:它是非特权阶层人民的、主张下层人民的解放和尊严的政党。这一切也都结束了。

从前,人们接受社民党的光环,是因为它的党员、干部和议员本身就来自较低的阶级,在政治上不属于具有社会影响的阶层。然而,这种状况也彻底改变了。这恰恰标志着社民党历史上决定性的转折。至少在其干部和议员的圈子里,社会民主党是成功晋升者的政党。社会民主党人在 2007 年的纲领性口号——教育、终身学习、机遇、成就——反映了德意志联邦福利国家时代社会民主党内社会地位升迁者的成功生平的经验。但它和失败者的新体验,和社会最低 1/3 阶层在多次被割裂的共同生活历史中由于教育失败而遭受的耻辱毫不相干。这两个世界彼此之间是完全陌生的。

三

在这个被社会民主党人抛弃的世界里,新的“左翼党”正在与 20 世纪 90 年代还是社民党领袖和总理候选人的奥斯卡·拉封丹一起嬉戏。在左翼党内,拉封丹在其转党之后牢牢掌握着统治权——和 1997 年非常相似。当时,他以强硬的手腕率领着社会民主党人,并以这种方式坚定而充满活力地把他们拉进政府。在很大程度上,2007 年的奥斯卡·拉封丹的行为与辩论方式和 1997 年的奥斯卡·拉封丹完全一样。这正是社会民主党人今天的问题:他们的每一个指责——左翼党的行为是平民主义的,是蛊惑煽动的,是追寻虚幻目标的——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揭发了他们自己,至少是自己刚刚过去的,固有的政治口号。借助这些口号,他们在 1998 年成功地进入内阁。

因此,社会民主党人完全陷入了窘境。作为掌权的政党,他们在政府任期核心时期的执政往往与从前纲领中的承诺完全不同。尽管如此,他们随后在选战期间还是能够令人信任而又令人惊异地打出社会福利这张牌,并招来冷酷的新自由主义的威胁,以便在某种程度上重新集合起此前还深感失望的、有时已经放弃了选举的支持者。

然而,这种手法在未来几乎不可能再成功了。因为奥斯卡·拉封丹

现在作为一位政治家在政党世界登场了,他也精通,甚至更加精通这种表演;他也能够雄辩地在社会问题上炫耀,鼓动性地、强硬得多地要求社会公正,公开抨击“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阴谋诡计——这样就能够把选票引到新左翼社会主义者的阵营。

四

概括德国社民党目前的两难处境,其实就是成功导致了挫折和衰落。因为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至少对于其核心群体,即专业工人的精英,是非常成功的。这一群体实现了社会主义所最终关心的物质富裕、教育和文化参与、参与公民社会和被认可。但社民党的这一传统核心群体因而也到达了公民社会的中间。他们发迹了,是德国新的,当然也是自由主义的,肯定是更加合群的、更少偏见的统治集团的一部分。现在,社会民主党的核心群体不再站在与资产阶级社会敌对的反对派立场上了。

在这个意义上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当然也不再是左翼的,甚至不再是社会主义的运动。社会主义曾是我行我素者和受亏待者的意识形态。其中,包括很多具有伟大才能和天赋的人,包括雄心勃勃的力量,这种力量催人向前向上,并向资产阶级表明将竭尽全力清除其生活道路上的障碍和封锁,必要的时候还将粉碎它;其中,蕴涵着社会主义解放运动的基本的力量,它同时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之火的燃料。从这些素材中培育出了权力意志、坚强不屈、果敢坚毅,有时还有社会民主党领袖——如奥古斯特·倍倍尔、赫伯特·魏纳、维利·勃兰特,是的,还有奥斯卡·拉封丹和格哈德·施罗德——在权力政治上绝对不可或缺的勇气。所有这些人都在资本主义社会忍受了其最初的社会力量的低下。他们将个人的挫折与抱负转化为政治参与,转化为社会民主党的解放的热情。

这些具有天赋的、执著向前向上钻营者中的倒数第二个人^①和1998~2005年的联邦总理格哈德·施罗德一道同行。社民党现任主席库特·贝克可以说是这种出身和(衣着)式样的最后一人。目前跟随社民党的、国会里的后备力量通常已经是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他们缺乏被歧视和受屈辱的体验,因而也就缺乏通过批评令人烦恼的社会

^① 指奥斯卡·拉封丹——译者注。

状况而独具特色的基本渴望,缺乏向处于社会优势的对手展示更多成就的基本渴望。新一代不再像历史上的社会主义那样,几十年都在考虑“反对现实”,而是——被他们教条地看做“别无选择”的——基本现实的极端热心的辩护者。他们组成的新社会民主党日益成为特氟隆政党——具有平滑的表面,但其实什么东西在它上面都呆不住。

社会民主党往往是已经经历了严重的危机和萎缩时期,然而随后总是能够令人惊奇地再度恢复元气。作为雄心勃勃的受亏待者的反对派运动,它总会有通向活泼沸腾的再生的源泉。但是,一些人认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社民党不再是解放运动,而更多的是作为社会民主和经济民主的政党处于其历史的秋天。作为新发迹者的利益群体,社民党在 21 世纪将发挥另一种作用。在这个世纪里被剥夺权利的人同样必须调整,因为他们需要一个新的政党、一种新的思想、一种新的政治和社会意志构成方式。这并非完全不可能,即 21 世纪新的被剥夺权利者随后将发现,20 世纪工业社会工人精英的老政党是一个顽强的对手。

我非常高兴,我的这本书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我谨希望有兴趣的读者能够从中获得信息和知识。特别感谢张文红博士为忠实原文的翻译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弗兰茨·瓦尔特
2007 年夏于哥廷根

续写辉煌抑或雄风不再？

——译者序言

德国社会民主党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SPD) 是德国历史最悠久的政党,也是唯一历经 19 世纪后半期以来德国历史发展的所有阶段而生存至今的政党。“二战”之后,德国其他各种政治势力大都进行了党派重组,只有社民党延续了其历经“二战”仍未断裂的历史。迄今,它已经走过了 140 多年的风风雨雨,从一个受歧视、受迫害的边缘政党发展成为德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从长期在野的反对党变成了单独或联合治国理政的执政党。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德国社民党也逐步完成了从工人阶级政党向人民党,从无产阶级向新中间的转变。自 1998 年以来,作为执政党的德国社民党面对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挑战,始终挣扎于维持自身的传统价值抑或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的两难困境之中。能否实现新的突破与超越,将决定德国社民党是否能够在新世纪续写其辉煌的历史。

—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863 年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和 1869 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

1863 年 5 月 23 日,全德工人联合会 (Allg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 在莱比锡成立,斐迪南·拉萨尔当选为主席。联合会章程宣称,将代表“德国工人等级的社会利益”,追求消除“社会的阶级对立”,规定“任何德国工人,只要提出简单的入会声明,都可以成为享有完全平等表决权的联合会会员”。但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之后并未迅速发展壮

大,反而出现了内部的思想分歧。

1869年8月7日,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在爱森纳赫创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partei)。这是第一个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的工人政党。它的名称虽然不是共产党,但其性质基本上是共产主义的政党,并且是第二国际时期各国建立的28个工人政党中最强大、最有影响的一个。

1875年5月,全德工人联合会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哥达合并,成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zial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合并之后,该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日益增长,在1876~1877年议会选举中,社会主义工人党得票49.3万多张,成为最强大的反对党。德国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的成就给统治阶级造成很大威胁,以“铁血首相”俾斯麦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对此深感不安,俟机进行镇压。1878年10月,帝国议会借口年初发生的与社会主义工人党毫无关系的刺杀德皇事件,通过了《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社会治安的法令》(简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使社会主义工人党处于非法状态。该党随后以成立诸如体育、音乐俱乐部等方式继续进行活动。

然而,专制国家的高压政策激起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强烈反抗,工人运动依然迅猛发展。在此期间,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主导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该党的革命性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水平。1880年8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瑞士维登秘密召开党代表大会,宣布将以“一切手段”坚持斗争。值得注意的是,《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一方面使德国党在理论上更激进;另一方面,却使该党在实践上向议会改良的道路发展。由于《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在查禁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的同时,允许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议会选举,允许其议会党团和议员在国会开展工作。所以,社会民主党人积极利用议会合法讲坛展开活动,该党在议会选举中的得票数也在不断攀升。

1890年9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被废除,德国社会民主党恢复了合法地位,并更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俾斯麦最终不仅没有摧毁社会民主党,反而使其更加强大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890年的帝国议会选举中得票率达19.7%,共计142万票,比“非常法令”颁布之初多了3倍,为各党派得票之最。此后,该党持续发展壮大,1898年的得票数突破了200

万；1903年突破了300万；1912年增加到425万，占总票数的34.8%，并赢得110个议席，成为最强大的议会党团。

随着合法地位的恢复和在议会选举中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改良主义开始在社民党内蔓延，革命与改良也成为德国工人运动内部长期存在的两种矛盾倾向。该党于1891年10月通过的《爱尔福特纲领》就突出地反映了这种情况。这部纲领包括理论和实际政策两个部分。理论部分论述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实际政策部分则提出了普选制、言论集会结社自由、8小时工作制等一系列改善现状的具体要求。也就是说，在理论部分指明对社会制度实行彻底变革的革命目标的同时，实际政策部分则肯定了争取改良的合法斗争的必要性。然而，这两个部分却缺乏衔接，是理论与实践、最终目标与现实政策的脱节。此后，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趋势似乎是逐渐放弃阶级斗争尤其是暴力的阶级斗争，走向议会民主制。改良主义在理论上的突出代表就是伯恩施坦。从1896年起，他发表一系列文章，要求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主张社会民主党必须放弃过时的革命口号，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将社民党定位为“一个力图通过民主改良和经济改良的手段来实现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党”。他的言论引起了激烈的党内争论，以倍倍尔、考茨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他予以驳斥，但改良主义思潮仍在党内蔓延，而当时的客观环境和党的实际状况也为其提供了条件。

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社会民主党投票支持德意志帝国使用武力手段解决争端。与战前的反战原则相比，这种做法无疑是一种巨大转变。因此，“一战”对德国社民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直至党的分裂。

首先是社民党左翼代表人物卡尔·李卜克内西于1914年12月在帝国议会投票反对战争拨款，1915年，20名社民党议员跟随这一立场。1916年，社民党议会党团以党的纪律为名，开除了这些党员。这些被开除的党员先是于1916年组成了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联盟，最后于1917年4月成立了“独立德国社会民主党（Unabhaengig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USPD）”。该党坚持左翼立场，其成员包括伯恩施坦、

考茨基、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等；而社民党的其余部分则成为“多数派德国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Mehrheitspartei, MSPD)”，奉行与统治阶级合作甚至结盟的路线。

“一战”结束之后，斯巴达克团先是和其他激进左翼的代表于1918年12月组建了德国共产党(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KPD)，并于1919年1月在柏林发动了以失败告终的斯巴达克团起义。而以艾伯特和谢德曼为代表倡导改良的多数派德国社会民主党则于1919年2月13日与天主教中央党和资产阶级左翼政党德国民主党(Deutsche Demokratische Partei, DDP)组成联合政府，艾伯特和谢德曼分别成为魏玛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和总理。从1918年11月至1930年3月，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多次掌握政权；艾伯特直到去世一直担任魏玛共和国总统。社民党在魏玛共和国期间参与制定了《魏玛共和国宪法》，推动了比例代表制、妇女选举权、8小时工作制等多项在劳工权利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改革，以及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等方面的一系列社会政策法规，使魏玛共和国进一步向社会福利国家迈进。

1920年秋，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党代表大会多数派决定加入共产主义国际，但独立议员、干部和党报编辑的主体却没有跟随多数派加入德国共产党。缩小后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由于双方在政治理念上的巨大分歧而渐行渐远。德国共产党谋求按照苏联的道路，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独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改良派则试图放弃暴力斗争，通过议会民主道路去改良资产阶级的国家和社会，这与多数派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念相差无几。于是，独立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22年9月与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合并，社会民主党在经历了5年的分裂之后重新统一了。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则永久地分裂了。

1921年9月18~24日，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在格尔利茨召开代表大会，并通过了一部新纲领。与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相比，这部纲领具有明显的改良主义倾向：新党纲宣布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性质是“城乡劳动人民的党。它力求使一切依靠自己劳动成果为生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在共同的认识和目标下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也许，这可以被视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从工人阶级政党向人民党转变的最初构想；新党纲还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对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论证，并

倾向于伦理学的论证,认为“争取无产阶级解放的阶级斗争”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道德的要求”,表明该党要争取那些虽然接受社会主义目标,却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集团,预示着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新党纲把魏玛共和国视为“自由的人民国家”,提出了“保卫共和国”的口号。

然而,“一战”后的德国,经济非常困难,每年向战胜国支付的巨额赔款,使国家处在难以摆脱的经济危机之中。而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和中央党布吕宁政府所采取的极端节约政策,更使失业率不断上升,民众生活日益艰难。人们为摆脱苦难而期盼救星,这就为希特勒极右翼的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National 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 Partei, NSDAP),即纳粹党的上台铺平了道路。尽管希特勒后来把德国带入更深的灾难,但当时在人们眼中,他就是德意志的救星。希特勒充分利用民众希望摆脱苦难的心理,充分调动其狭隘的民族情绪,并巧妙地混淆了祖国、民族与国家概念的本质区别,把他自己及其掌握的权力装扮成德意志民族的化身,并于1933年1月登上总理的宝座。

希特勒上台之后,先是通过1933年2月的“国会纵火案”取缔了德国共产党,接着于6月取缔了德国社民党。社民党的活动从此转入地下,领导层也被迫流亡。在纳粹统治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遭到了比“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更为残酷的迫害。一部分党员被迫流亡国外,留在国内的党员惨遭杀害或被监禁,少数幸存者转入地下开展抵抗运动。鉴于这种形势,社会民主党不得不重拾革命传统,甚至发出相当激进的革命号召。在此期间,德国社民党与德国共产党的抵抗组织有过接近,但是由于政治理念上的巨大差异,最终也未合并。

三

“二战”结束之后,战败的德国被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大柏林作为特区也分为相应的4个占领区。

苏联占领区于1945年6月10日允许在其区内建立党派、工会及其他政治和社会团体。在苏联占领者的支持下,德国共产党和苏占区的德国社民党于1946年4月合并,成为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 SED)。194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 DDR) 成立之后,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成为执政党,直到 1990 年德国重新统一。

而在西部的美英法占区,德国社民党拒绝与德国共产党合并,并且延续了该党在纳粹统治之前的政治传统,其代表人物库尔特·舒马赫也在此时对党的未来走向施加了强烈影响。他认为,德国社民党必须扩展其社会基础,要向中间阶层推进;最终目的是议会民主制,党派多样化,国家只对经济实行适当的温和调控。

在 1949 年 8 月举行的战后西德第一次大选中,社会民主党仅获得 29.2% 的选票,131 个议席;而其竞争对手联盟党则获得 31% 的选票,139 个议席,并掌握了组阁权。此后的几次大选中,联盟党的得票率不断攀升,在 1957 年甚至获得 50.2% 的绝对多数票。而社民党员人数也开始急剧下降,从 1947 年的 87.5 万人降到了 1958 年的 62.4 万人。德国社民党只能沦为“建设性的反对党”。

几次选举失败使社会民主党认识到,战后德国的社会条件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不及时调整党的纲领和政策,就难以重新执政。1957 年选举失败之后,社民党内开展了一场关于改革的大讨论。重点是抛弃意识形态“包袱”,特别是清除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和对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信仰;改变党的性质,使之向一切社会阶层,特别是中间阶层开放,以适应战后社会结构的变化。1959 年通过的《哥德斯堡纲领》就是这场讨论的最终结果。它标志着德国社民党在政治理念上的一次决定性转变:抛弃了一切马克思主义的词语和论证,公开声明:“社会民主党已经从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了一个人民的政党”;宣称民主社会主义“植根于基督教伦理学、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社会民主党“是由具有不同信仰和思想的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自由、公正、互助”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社会主义是一项持久的任务,即争取、捍卫自由和公正,而且它本身在自由和公正中经受检验”;实现这项任务的途径是“在平等的条件下同其他民主政党进行竞争,以赢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这就彻底切断了世界观和理论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渊源关系。

《哥德斯堡纲领》奠定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社民党也真正成为全民党,并因而赢得了更多的选民支持,最终于 1966 年参加了大联合政府,并于 1969 年开始作为主角执政。1969 年的联邦议

会选举之后,德国社民党和自由民主党(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 FDP)组成联合政府,维利·勃兰特出任战后第一个社民党的联邦总理。他实行了突破性的“东方政策”,陆续与东欧国家包括民主德国签订了一系列和约,包括承认民主德国的国际法地位和波兰西部边界的合法性等等。这使得联邦德国与东方阵营的外交正常化,为联邦德国赢得了更多的外交空间和国际声誉。

《哥德斯堡纲领》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从一个反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政党变成一个体制内的政党。之后的几十年间,社民党不再一如既往地批判资本主义,而更多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寻求社会改良,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尤其是对党的组织扩大和上台执政起了重大作用。社民党党员人数在1960年达到65万人,1965年增至71万人,1973年达到近100万人;党员逐渐年轻化,1960年,40岁以下的人在新入党的党员中占55.3%,1969年占67.2%,1972年已达到75.2%;党员的构成也发生了改变,1960~1969年,工人在新入党的党员中所占的比例从55.7%下降到39.6%,而职员和公职人员则从21.2%上升到33.6%,到1972年,工人在新吸收的党员中仅占27.6%,而职员和公务员则占34%,超过了工人;在大选中的得票率持续上升,从1957年的31.8%增加到1961年的36.2%,1965年的39.3%,1969年的42.7%,1972年达到45.8%。

四

1982年的议会选举之后,德国社民党再度沦为反对党,直到16年之后的1998年与绿党/90联盟一起赢得联邦议会选举。社民党人格哈德·施罗德出任联邦总理。2002年9月,德国社民党和绿党再次赢得联邦议会选举,施罗德连任总理。然而,施罗德和社民党政府面对的是巨大的挑战和压力:一是经济全球化及其给德国经济带来的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二是德国社会老龄化加速,社会保障系统的财政基础难以为继。从20世纪80年代起,德国福利国家的困境已经开始显现,社会福利水平过高,是制约其经济发展,尤其是影响就业率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使德国走出经济连年疲软的阴影,“红绿联盟”政府不得不下决心对福利制度进行彻底变革。

2003年3月14日,德国总理施罗德在国会宣布了题为“2010规划”

的改革方案,2003年12月19日,联邦德国议会和参议院通过了“红绿政府”的一揽子改革方案,使“2010规划”的核心要点得以通过。其目标是在中短期内加强德国的经济实力、创造就业岗位并使福利体制现代化。“2010规划”的改革措施涉及了从减税到劳动力市场改革,直到社会保障体制等各个领域,涉及了德国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堪称德国战后历史上规模最大、程度最深的一场改革。

应该说,社民党政府的此次改革是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振德国经济实力的必要举措。然而,“2010规划”的改革政策的实施却始终伴随着困难和阻力,社民党也因此经历了一连串的打击:地方选举接连失败、民众支持率降至历史最低点、大量党员退党等等,尤其是使社民党内出现了分歧。社民党左派反对在用工制度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改革,认为这将损害广大工人的利益;作为社民党最重要合作伙伴的工会,也因这场改革而同社民党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工会反对降低社会福利的改革,认为“红绿联盟”政府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的改革对社会下层尤其不公正,认为社民党背离了其传统价值,因而对这场改革持公开的拒绝态度。自“2010规划”颁布以来,工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一系列抗议、游行、示威活动。最终,这股抵抗改革的力量从政治层面开展活动,于2005年1月22日在哥廷根成立了一个“站在社民党左侧”的左翼政党——“选举替代—劳动与社会公正”(Die Wahlalternative - Arbeit & Soziale Gerechtigkeit, WASG)。社民党前主席奥斯卡·拉封丹于2005年6月宣布退出社民党,加入“选举替代”党。2007年6月16日,德国左翼党—民社党和“选举替代”在柏林合并,成立了新的“左翼党”。拉封丹当选为左翼党的主席之一。

这种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民党目前的尴尬处境,是社民党传统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与全球化时代的冲突的表现。社民党面临着全球化、知识密集型经济的出现、人口统计的变化、持续的大规模失业以及公共财政预算危机等等问题,从前的传统政策已经难以应付这一切了。

社会公正和社会团结是社民党的传统基本价值观,而以往达到社会公正的手段就是进行财富再分配,使人人享有社会富裕成果和社会保障。社民党希望在坚持这些民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对德国的福利体制进行彻底改革,但改革所遭遇到的空前社会阻力证明,这一想法有些乐观了。社会福利国家改革使社民党遭受最多的批评就是背离了其传统的